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问题

袁成毅

内容提要 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注重定性的基础上,日渐重视量化,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两个战场抗战的战绩;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中国抗战的人口与财产损失(包括侵华日军暴行以及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延误等)。量化研究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广泛运用,使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这较之既往口号式的宣教无疑是一巨大的进步。不过也要注意,由于研究者立场不同,处理史料的方法有异,此外,或多或少由于受民族集体记忆的影响,量化中也存在着一些计量方法上的不当或随意性问题。

关键词 抗日战争 研究 量化

计量史学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界对于计量史学的概念、内涵虽然有不同的阐释和实际运用,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对一系列可以量度的现象进行的历史研究。^①80年代以后,此方法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除了依照计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的研究外,受计量史学的影响,各种研究中的量化也极为普遍。以抗日战争史研究为例,量化研究除了在传统的战时经济、财政、金融等领域广为运用外,在我们以往习惯“定性”的其他方面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对抗日战争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以抗日战争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在抗战结束时就已经开始。^③早期的研究多注重“定性”,在抗日战争史的著述中,通常多用一些较为模糊的诸如“起了决定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中流砥柱”、“不可估量”、“无以计数”等语汇。其实这些概念或多或少还是隐含着量化或统计的内涵,只不过由于史学工作者出于具体考证的困难或者缺乏量化的观念,使本来可以进行定量判断的概念变成了缺乏定量依据的简单定性。事实上,作为一场举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从大小规模的战役、战争的投入到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等等其实都是可以也是应当量化的。

可喜的是,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量化现象随处可见,其中在三个领域最为明显:第一,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敌的不同战绩和贡献;第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第三,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

① [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② 本文不打算在计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框架下讨论,只考察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相对于定性研究而言的量化研究。

③ 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史考察,可参看荣维木:《抗日战争史》,载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程的延误。^①

一 两个战场战绩的量化

近三十多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一个逐步回归理性的过程,即一方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这一观点,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以及全国各抗日阶层的作用,这种理性回归的过程,基本上是通过量化得以实现的。

早期的抗日战争史被纳入中共党史的叙事框架,在讲到抗战的贡献时,虽然也有一些量化的表述,但仅仅关注到抗战时期中共的发展和抗日战绩,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多作这样的表述:“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扩大,建起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十九个解放区,拥有总人口一亿二千余万,人民解放军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人民战争路线的结果……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敌大小战斗十二万五千一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一百零一万零九千九百九十九名,俘获日伪军五十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名,投诚反正日伪军十八万四千名,总共日伪军损失兵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九名。”^③在这些表述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国抗战的一个战场,看不到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的客观事实。

差不多也正是从8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在重复上述观点的同时,开始通过量化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正面评价,如王振德认为,由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国民党始终留在了统一战线内,22次会战,主要战斗1117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0%以上。^④这一时期,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缓和,战后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蒋纬国所著《抗日御侮》吴相湘所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以及国民党军政要人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报告中所列的国民党军方统计资料,也被学术界广为引用,对于1938年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肯定成了学界的共识。

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学者通过量化分析,对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江于夫认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了南昌会战等9次大规模战役,占国民党22次会战的41%,甚至还有过一些攻势作战,难能可贵,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有大的战斗496次,占整个抗战时期战斗的44%,共伤亡137.6万人,占整个抗战时期伤亡人数的43%。^⑤作者通过这些数据得出了国民党在相持阶段仍积极抗日的结论。

在对正面战场战绩给予肯定的基础上,也有学者看到了这种量化所带来的问题。魏宏运认为:“两个战场抗敌的比例,经常有些变化。数字的计算,因学者们各自的方法不同,自然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敌后游击战争已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如果没有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日军的大量兵力,中国的大西南和西北,就会遭受敌骑的践踏,就有沦

①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涉及的量化问题非常多,本文难以逐项加以评析,也难以就每个数字的真实性进行科学的论证,仅就提到的三个重要方面作一些疏理,以期对量化的现况和存在问题加以剖析。

②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

③ 萧超然、沙健孙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简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④ 王振德:《中国抗日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

⑤ 江于夫:《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抗战问题再探》,《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

陷的危险,那么日本就可能宣布,它征服了中国。”^①张廷贵则具体分析了两个战场的歼敌总数,认为日本在侵华八年中(不包括东北),死伤官兵 133万余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 52万多人,占 40%;歼灭伪军 118万,几乎百分之百。国民党军队歼灭日军 80万,占 60%,基本上没有伪军。从歼灭日军的绝对数字看,国民党多于我军,但按军队人数比例计算,中共军队数量少(抗战开始为五六万人,抗战胜利时为 94万人),国民党军队数量多(抗战开始时陆军 170多万人,抗战结束时为 440万人),中共军队歼灭日伪数则多于国民党的两倍。他认为这些数据进一步显示了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②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虽然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分,但它毕竟是一场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因此也有些著作更关注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在军事科学院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 1945年 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 14年之久。特别是在 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的 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 200余次,大小战斗近 20万次,歼灭日军 150余万人,歼灭伪军 118万人”。^③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有助于强化“全民族抗战”这一概念,中国官方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候,就明确作出如下的定性表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④

由此可见,关于两个战场的战绩问题,从最早的只计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抗日战绩,到兼计正面战场的战绩,进而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绩形成一个中国抗战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二 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贡献的量化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过多地强调了苏联对击败日本的作用,如毛泽东在 1945年 8月 13日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⑤此外也有“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的说法。毛泽东的上述看法在早期的抗战史研究中也得到了响应,如李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认为:“1945年 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苏联的出兵,使日本丧失负隅顽抗的可能,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⑥

还有一种情况是过多地强调美国对击败日本的贡献,这在日本比较普遍。早在日本刚战败的 1945年 12月,美国国务院调查分析局对住在北京的 385名日本人实施的调查中,87%的人认为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⑦从战后日本学界对于战争的时期划分来看,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 1941年 11月称作“中国事变”,把 1941年到 1945年称太

① 魏宏运:《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光明日报》1991年 10月 23日。

② 张廷贵:《从若干材料看我军在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军事历史》1985年第 4期。

③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第 624页。

④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 9月 4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23页。

⑥ 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第 383页。

⑦ 《日》吉田裕著、刘建平译:《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新华出版社 2000年版,第 53页。

平洋战争,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实际上是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是美国占领时期对日本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轻视。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进行了量化研究,发表了众多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被官方所采信。^①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官方的表述是:“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迫使日军放弃北上计划,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的作战。中国人民在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其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提出了颇有挑战性的观点。2004年,互联网上有托名张忠义的作者发表了《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的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③该文认为八年抗战中国虽然对战胜日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美国才是战胜日本的主力,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我们是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总数对比,才得出70%这一比例。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和残废伤员195万人^④,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的22%。而约有120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占二战时日军死亡总数的64%。第二,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的说法站不住脚,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是只看战争前期情况而不提整个战争全局,另一方面混淆了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和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日本陆军二战时期的四大战略集团分别为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的两支日军中,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所对付的实际只是“中国派遣军”。因此,我方所称敌后游击队抗击侵华日军的60%,只是计算了日军中的“中国派遣军”力量。此外从日本投降时的兵力分布情况来看,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所占比例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

上述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它提醒了我们量化的科学性,值得重视。

除了上述争论,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的说法,其实也是旨在说明中国抗战的艰难与巨大贡献。当然,研究时段的向前延伸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过去我们在中共党史的框架中,将1931—1937年的历史纳入“国内革命战争”中加以叙述,虽然也会提到这一时间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一面,但其重心是强调了国共之间的内战,随着抗日战争时段的向前延伸,我们很自然地就将1931年以来国共从内战走向合作纳入了抗日战争的研究视野。

① 相关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齐世荣:《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王振德:《中国抗日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罗焕章:《中国抗日战争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贡献》,《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等。

② 《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9月4日。

③ bbs.tiexue.net/post_1320465_1.htm

④ 据日方材料,日本投降之际,在中国的陆军有1049700人,海军有63755人,合计1113455人。二战时期日本军民的伤亡数为:陆军死亡与失踪1439101人,残废85620人,共计1524721人;海军死亡与失踪419710人,残废8895人,共计428605人,以上各项合计为195万人。参见〔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卷,军事译社1978年版,第392页。

三 中国抗战损失的量化

在各种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量化中,中国抗战损失最受关注,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抗战的人口伤亡与日军的各种暴行;第二,中国抗战的财产损失以及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一)关于中国抗战人口伤亡与日军各类暴行的量化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就开展了有关抗战损失的调查和统计,战后的1947年5月,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正式列举了中国在抗战中的各项损失,这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在抗战时期所蒙受的损失以官方名义发表的唯一一次统计数据。根据该报告,中国军民人口伤亡总数为1278万人。^①

学界普遍认为国民政府公布的上述统计结果不够全面,因此,关于中国军民伤亡人数的问题一直存在众多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数字多数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统计和调查基础之上,只能看作是一般性的估计。

在中国大陆学者中,军事科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认为中国军民在战争中的伤亡数为2000万人。^②刘大年则认为中国军民的死亡数为2000余万人。^③胡绳认为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计2100万人以上。^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其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认为八年间关内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在内)达2100万人。^⑤王桧林认为中国军队伤亡为380万人,民众伤亡1800余万人(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共达2100万人。^⑥何理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3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共计2130万人。^⑦罗焕章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人民死伤1800万人,共计2180万人。^⑧李新认为中国军队伤亡40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以上,共计2200万人。^⑨刘庭华在《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中提供的数据是:国民政府军伤亡320万人,中共武装部队中伤亡58万人,民众伤亡1874万人,共计损失人口2250余万人。^⑩

台湾学者关于中国战争伤亡数目多引用何应钦的说法,即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军人伤亡(陆、空军)320余万人,人民直接、间接死伤者2000万以上。^⑪

上述关于中国军民伤亡总数的说法虽有不同,但基本上处于2000万到2200万的区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军事科学院部分学者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作出了新的估计,其结论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

① 迟景德著:《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台湾“国史馆”1987年印行,第273—274页。

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4页。

③ 胡绳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④ 刘大年:《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日战争研究》增刊《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集》,《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1995年编印,第88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6页。

⑥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伟大的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同心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⑦ 何理著:《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⑧ 罗焕章:《中国抗日战争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贡献》,《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⑨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⑩ 刘庭华编:《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82页。

⑪ 何应钦著:《日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403页。

亡总数达 3500 万人以上”。^① 在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和 6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此说法被广为采纳和引用。^②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该项数据的完整研究成果,因此不少海内外学者颇为困惑,台湾学者迟景德认为:“本人绝非要否定这些统计数字,但以两岸相隔阂,事有不通,诚不知其统计数字是如何产生的?是经过重新普查?抑或是根据资料透过研究作合理的推估?”^③

正因为中国军民伤亡 3500 万的说法也并不是实证的研究结果,因此对于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继续成为 90 年代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热点。^④ 袁成毅以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为基础,再增加了中共解放区的损失数据,另外将所能掌握到的一些其他伤亡数据作了相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最低限度的伤亡人数为 2228 万余人。^⑤ 米红利用 80 年代以后所获得一些回顾性调查资料及被海内外所公认的 1935 年人口统计资料,用人口学方法估计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 3000 万。^⑥

卞修跃在其博士论文及相关的成果中对中国战时的损失也进行了新的考察。其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据各省战后调查统计结果,初步开列出各省区的直接人口损失数,对没有寻到战后调查统计结果的部分省市,则根据地理相连、战情相类的原则,各选具体的参照省区为基数,以统一方法估算,分别求出这些省区抗战人口损失的估算数字。此外对劳工、东北地区、伪军及兵役壮丁等方面的战时人口损失也都进行了分别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人口包括死亡、受伤、失踪等在内的各项损失数最低限度为 4500 万人,估计中国战时的人口损失可能超过 5000 万人。^⑦

透过上述各种估计,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抗战伤亡人口总数有一个从 2000 多万到 5000 多万的区间,由此可见要得出一个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的结论的确是极其困难的,要推进此项工作,一方面有赖进行全面细致的史料整理和调研^⑧,另一方面对日军暴行和中国军民伤亡作分类的量化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对平民的施暴形式五花八门^⑨,其中,广受关注的有日军对中国平民的集体大屠杀、细菌战与化学战、掳掠劳工、性暴力(包括慰安妇)等。^⑩差不多每一种暴行都涉及到了量化问题。

在侵华日军对平民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遇难 30 万的说法最有争议。此数字主要来源于 1946 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的调查,根据后者的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25 页。

② 《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 年 9 月 4 日。

③ 迟景德:《从抗战损失调查到日本战败赔偿》(“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1995 年,台北)。

④ 参见孟国祥、张庆军:《关于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3 期;孟国祥、喻德文著:《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袁成毅:《抗战时期中国最低限度伤亡人数考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4 期;姜涛、卞修跃:《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 年 8 月 16 日。

⑤ 袁成毅:《抗战时期中国最低限度的人口伤亡》,《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4 期。

⑥ 荣维木:《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载“战争遗留问题和中日关系”座谈会专集《抗日战争史通讯特刊》2003 年,第 74 页。

⑦ 姜涛、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之初步估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刊印,2005 年 8 月,第 572—581 页。

⑧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 2006 年开始组织全国各省市的党史部门开展中国抗战损失调研,调研结果正在形成。

⑨ 90 年代初,由河北省政协文史委牵头,协同 26 个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历时三年半时间,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该著之旨虽然并非求得各种暴行受害者的总体数量,但它收录了侵华日军 2272 条暴行,差不多每一条暴行都有伤亡的数据。

⑩ 相关研究综述参见郭德宏等:《近 10 年关于日军侵华罪行和遗留问题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6 年第 1 期。

屠杀的人数不低于 34 万。1946 年 2 月 17 日上海《大公报》就以《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 惨死同胞约三十万》为标题作了报道。但战后 60 年来, 围绕大屠杀 30 万的说法, 学界一直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论, 中国学者多数坚持这一说法, 如孙宅巍经过考证, 认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中, 经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 18.5 万余具, 市民私人自动组织掩埋同胞尸体 3.6 万余具, 伪政权出面雇工收尸 7400 余具, 日军动用部队掩埋和处理尸体 15 万具。以上述数字再扣除收埋统计中可能交叉的数字, 以及约 1 万名在战场阵亡的军人数,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确有 30 万人以上。^①

日本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有着相当悬殊的看法, 多数并不认同 30 万这一说法。杨大庆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的根本原因, 认为“对争论的主体来说, 有益于反击争论对手。对一部分日本人来说, 30 万人这个数字是典型的中国式夸张, 中国人制造的神话, 是一种宣传, 是东京审判史观的象征。可是对于另一方压倒性多数中国人来说, 30 万人这个数字是战后军事法庭下达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正义的历史判决。一部分日本人曾试图全盘否定战后联合国军方面进行的军事审判。为表示反对, 中国再次确认了守护这个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上的数字的意义”。^②

有关日军细菌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 其统计数据大多来源于实地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估计。最近十多年里, 有不少学者以及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辩护团对浙江、湖南、江西、云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获得了很多新资料, 刘庭华根据各地调查材料, 得出的结论是: 日军在中国 20 个省区使用过细菌武器, 染疫、死亡人数约 120 万人。^③ 尹集钧也是根据各地的调查结果, 认为迄今为止可以统计出的中国受细菌战之害死亡的人数超过 7 万人, 预计会达到 200 万人。^④

对于日军实施毒气战、化学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 也有学者作了初步估计。步平认为在战争期间, 日本至少生产了 700 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 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 2000 次, 造成近 10 万人的直接伤亡; 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了 2000—3000 人, 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⑤

关于日军掠夺、役使和迫害劳工的问题, 陈景彦主要考察了被掳掠到日本的劳工情况, 认为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应为 38.9 万人, 而从收容所出发即在“契约数”以内的劳工则在 4.1—4.2 万名之间。除乘船途中和登陆后至日本企业之前死亡 812 人外, 在日本企业中死亡 5999 人, 再加上送还时死亡 19 人, 总计死亡 6830 人。^⑥ 居之芬考察了从 1935 年至 1945 年 8 月日方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 认为在此期间日方强征中国劳工总数约 1500 余万人 (包括在东北使用 1000 余万人, 在华北使用约 360 万人, 在华中、华南输出使用 150 万人, 在蒙疆使用 40 万人, 在日本使用近 4 万人, 朝鲜使用近 0.2 万人等)。^⑦ 吴天威认为, 日本从 1931 年至 1945 年的 14 年, 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众多的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大量奴役中国劳工, 其总数达到 3700 万人, 在这些军事工程和厂矿中, 中国劳工惨遭虐待, 被迫害致死者近千万人。^⑧

慰安妇问题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学者涉足该领域较早的是苏智良,

① 孙宅巍著:《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38—440 页。

② 杨大庆:《南京残暴行为——建设性的对话是否可能》《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2—153 页。

③ 刘庭华:《侵华日军化学细菌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述略》,《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 年。

④ 扈良:《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举行第四届学术年会》,《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⑤ 步平:《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民国档案》2003 年第 4 期。

⑥ 陈景彦:《二战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历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⑦ 居之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⑧ 吴天威:《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迫害致死中国劳工近千万》,《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1 期。

他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日军每侵入一地,便掳掠大量当地女子同行,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①

侵华日军的暴行当然远不止如上所述的几种类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侵华日军在华各种暴行作分类的量化研究,是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抗战军民伤亡的具体情形。

(二)日本侵华战争所致中国财产损失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总数多采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几种数据:第一、350亿美元说^②;第二、584亿美元说^③;第三、559亿美元说^④;第四、620亿美元说。^⑤这些不同的说法在各种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财产损失研究中往往因作者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转述或不同的发挥。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有了一些新的估算,其中关于直接财产损失的说法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调查与统计结果,而对于中国抗战的间接损失数则与国民政府战后的调查与统计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如1985年军事科学院发表的数字中就认为,抗日战争中,中国的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折合1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战争消耗400亿美元)。^⑥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八年抗战中,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⑦目前影响最广的一种说法来自于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该书所列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财产损失情况是:中国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⑧此说在学界内外被广为引用,同时也被官方所接受。^⑨

由于上述数据同样也没有相关调研成果的公开发表,因此也常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不过由于财产损失涉及到很多计量方面的困难,很少有学者就全国性的财产损失加以系统的量化研究。^⑩

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由清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虽然经历的内战和外战不断,但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在持续的时间、波及的范围和战争的规模上没有哪次战争可与1937年至1945年这八年的抗日战争相比。

90年代早期,台湾的郑竹园基于对战前中国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并参照国外学者有关中国战前GDP的发展速度,概括了中国抗战损失对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1937至1945

① 苏智良:《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② 《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帖》(原文未署年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44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2—34页。

④ 《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194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232页。

⑤ 参见吴半农:《中国驻日代表团劫物归还与赔偿工作综述》绪言部分(所署时间为1949年8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续编》第71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

⑥ 罗焕章、支绍曾著:《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7页。

⑦ 《中国的人权状况》,载《光明日报》1991年11月2日。

⑧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25页。

⑨ 《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9月4日。

⑩ 参见袁成毅《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把自1912年以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腰斩,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①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也指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看,这场空前绝后的侵华战争“把近三十年来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完全打断”,“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②

上述两种观点是基于对战前中国现代化发展情况和战争的破坏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其实都只是一个概数,它所说明的问题是,没有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肯定会有大的进步。

四 量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纵观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量化使定性研究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对抗战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也要看到,在量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史料的选择和处理问题。量化本身并不能排除主观任意性的可能。任何计量的方法,都是运用计量工具的研究者在起着支配作用,研究者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某种假设去收集和选择数据,而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有大量的史料留存下来,但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很多史料是需要认真分析的。比如战绩的问题,交战的各方在当时出于宣传和鼓舞自己队伍士气的需要,总是尽可能地夸大自己的战绩,很多数据其实并不准确,如果我们把战争期间国共双方战报中所列的战绩加在一起,会得出非常惊人的日军伤亡数,与日军的实际伤亡会存在很大的距离,当然日军的战报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此,选取史料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对新近调查所获的口述资料也同样有一个处理问题。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不少非专业人士在各地搞了大量的调查,如在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均有因对日诉讼而进行的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口述访谈,这些材料一方面的确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细致的考订,据此作出的死亡数的估计就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如据《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所载,1942年5月4日机对保山县城进行轰炸,死亡1万多人,因日军投放霍乱菌,城乡有6万多人死亡。^③事实上,滇西系山区,人口的聚集密度并不高,细菌战死亡率如此之多是令人生疑的。

其次,量化的研究必须将计量的对象尽可能做到概念清晰。比如,我们往往是将“敌”和“伪”、“伤”和“亡”并提,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严格界定的,如果模糊地用“敌伪”和“伤亡”就缺乏了科学性。又比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于“南京城区与南京周边”、“平民”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至于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的伤亡人口和财产损失有待厘清的概念就更多了,如人口伤亡是否应当包括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所导致的民众因疾病、饥饿等因素的死亡,财产的间接损失到底如何计量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问题。

再次,要防止出现“数字教条”。我们承认量化的方法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处理好定性和定量的关系,没有计量的分析为基础,有时候定

① 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

②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7页。

③ 沙必璐著:《血肉丰碑——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性的判断就缺乏依据;但是也只有通过定性的分析,量化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最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量化,也要尽可能防止一些情绪化的宣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沉重的集体记忆,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要尽可能少受情绪的支配,当下中国各类抗日战争损失数似有不断增加或扩大的趋势,这不符合科学的原则,诚如孙宅巍针对南京大屠杀所谈到的看法,即不要陷入研究的三个误区,那就是永远不变的数字,更加精确的数字和更多的数字。“只要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个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南京的中国死者数量这样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①实际上其他的量化也是一个道理,科学性不强的量化只会产生副面的影响,它也常常会被日本一些右翼学者拿来作为中国实施“反日教育”或“仇日教育”的口实。^②

(作者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孙宅巍著:《南京大屠杀》,第9—10页。

② 樱井良子:《日中战争死伤3500万、南京大屠杀30万人!》载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秘书处编印《识破历史的谎言》,第61页。